

## 新加坡華族兒童的家庭 華語讀寫環境與詞彙知識和閱讀能力

李麗  
南洋理工大學  
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

張東波  
密西根州立大學  
教育學院

趙守輝  
卑爾根大學外語系

### 摘要

本文考察了新加坡華族兒童家庭讀寫環境及其對兒童華語詞彙知識和閱讀理解能力的影響。218 名新加坡小學三年級華族學生參與了華語能力測試和家庭華語讀寫環境的問卷調查，調查內容涉及家庭閱讀資源、父母與子女的分享閱讀頻率、兒童自主閱讀頻率等。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在華語地位日漸式微的新加坡雙語社會，家庭華語閱讀資源不足，兒童的華語閱讀活動有限，同時華族家長對華語閱讀活動和與子女進行華語分享閱讀活動等缺乏熱情。回歸分析顯示，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對兒童的華語詞素辨析能力和詞彙知識有顯著預測力，並可能通過這兩項知識間接影響兒童的閱讀理解能力，證明了家庭在語言接觸或雙語環境下母語維護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新加坡 家庭讀寫環境 華語 詞彙知識 閱讀理解

### 1. 家庭讀寫環境與閱讀能力發展

發展心理學研究認為，家庭作為兒童最初的學習場所，為兒童提供了學習的機會；同時，父母的言行舉止也為兒童提供了榜樣性的作用，對兒童學習習慣的培養、學習興趣的建立和保持等都至關重要（Shaffer & Kipp 2010）。從以認知加工為導向的語言習得和閱讀發展的理論來看，良好的家庭讀寫環境（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可以強化兒童的口語能力，增強書面語的接觸或加工機會，並鞏固通過其他渠道學習的知識等。在闡述以輸入為驅動（input-driven）的語言學習理論時，Ellis（2002）指出，來自多種渠道的輸入（如，課堂和非課堂的輸入）是口語和書面語能力發展必不可

少的條件，其中語符（token）和語類（type）頻率至關重要，這一思想也顯現在現今流行的基於使用的（usage-based）語言習得模型中（Bybee 2010; Tomasello et al. 2005）。專就書面語發展而論，閱讀學家 Stanovich（1986）在分析和探討閱讀發展中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時，認為兒童閱讀的個體差異和認知發展存在著交互的（reciprocal）關係，閱讀發展受到書面語接觸（print exposure）水平的直接影響，並反過來影響兒童的書面語接觸或讀寫的興趣與動機。這一論斷在 Stanovich 與他的同事 Cunningham 的一系列後續研究中也得到了證實（Cunningham & Stanovich 1998）。

先前的研究發現，家庭讀寫環境是一個包含諸多因素的綜合體，這些因素對兒童的語言習得和閱讀及其相關能力存在不同程度的影響。從宏觀層面來看，家庭收入水準以及父母受教育的程度等，即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往往是家庭讀寫環境的基本特徵之一（Aram & Levin 2001）。在微觀層面上，研究者對於家庭讀寫環境包含的因素存在不同的意見，在研究家庭環境對兒童閱讀能力發展的影響時，學者們考察的著重點往往也有所不同。如，Leichter（1984）認為家庭讀寫環境應該包含三大方面，即家庭閱讀資源（如，家庭中書本等閱讀材料的數量），家庭成員與兒童之間的互動和分享閱讀，及父母對讀寫等活動的態度等。在考察加拿大學前或學齡兒童的家庭環境和閱讀能力時，Sénéchal 和他的合作者們（如，Sénéchal et al. 1998; Sénéchal & LeFevre 2002）則主要關注了幾種不同的父母與子女的共同閱讀活動對兒童習得閱讀相關技能的影響。除了父母參與的共同閱讀活動，Evans 以及其他學者對加拿大和美國學前兒童家庭環境和閱讀能力的研究則側重於分析兒童參與的家庭讀寫活動對其讀寫能力的影響（Evans, Shaw & Bell 2000; Griffin & Morrison 1997）。另外，父母參與的讀寫活動及其對讀寫活動的態度也可能影響子女的讀寫能力發展。熱衷於讀寫活動的父母可能成為子女的榜樣，影響子女對讀寫活動的態度，從而促進子女的讀寫能力發展（Weigel, Martin & Bennet 2006）。

儘管存在分歧，整體而論，研究者們大都關注如下的三個家庭環境因素以及他們對兒童閱讀及其相關能力或知識的影響。首先，家庭閱讀資源的數量很重要。家庭閱讀資源的數量與家庭的社會經濟背景有一定關係。Korat & Levin（2001）的研究發現貧、富家庭中可供閱讀的資源數量相差懸殊，因此閱讀資源的數量可能是這一階層家庭兒童閱讀能力發展的一個潛在因

素。Chiu & McBride-Chang (2006) 調查了 43 個國家兒童的家庭背景和閱讀能力，証實家庭中可供兒童閱讀的材料數量顯著影響兒童的閱讀能力。第二，父母參與的讀寫活動在兒童讀寫能力的發展過程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兒童（特別是低齡兒童）家庭讀寫活動中非常重要的一項便是與父母進行分享閱讀（shared/joint reading）。分享閱讀的形式各式各樣（如，父母聆聽子女朗讀、父母與子女共同閱讀、父母教導子女閱讀等），但共同的特徵是父母有機會直接介入孩子的閱讀過程，如，為孩子的閱讀理解提供指導和幫助等。前人的研究發現，父母與學前兒童的分享閱讀經驗能夠有效增加兒童的口語詞彙量（Frijters, Barron & Brunello 2000; Sénéchal & LeFevre 2002），並有助於提高兒童的閱讀理解能力（Roth, Speece & Cooper 2002; Sénéchal 2006）。Sénéchal 等人的一系列研究顯示，不同形式的分享閱讀經驗對兒童的口頭和書面語言發展的影響不盡相同。例如，Sénéchal et al. (1998) 在研究分享閱讀與加拿大幼兒園和小學一年級兒童習得英語閱讀技能的關係時，將父母與子女的分享閱讀區別為兩種形式，一種是一起讀故事書，另一種是父母在閱讀的同時教導子女讀寫。他們發現共同讀故事書對於兒童口語能力的提高（包括聽力理解、口語詞彙、語音知識）有一定幫助；而父母教子女讀寫除了能夠影響兒童的口語能力以外，還能進一步預測兒童的書面語言能力（包括詞彙認讀、字母知識和拼寫知識）。第三，隨著語言知識的豐富和閱讀經驗的積累，個人閱讀逐漸成為學齡兒童主要的家庭讀寫活動。具備一定語言知識和閱讀經驗的小學生，其個人閱讀頻率對閱讀能力的各個方面都有一定影響。Anderson, Wilson & Fielding (1988) 的研究記錄了 155 名美國小學五年級學生的各種課後活動，並測試了其閱讀能力。他們發現，相較於其他活動，課後的個人閱讀頻率是學生閱讀能力的最強預測因子。Nagy, Anderson & Herman (1987) 的研究也表明，學齡兒童的自主閱讀活動對其詞彙習得有顯著幫助，而這種從上下文中學習到的詞彙知識有可能繼而提高其閱讀水準。Mol & Bus (2011) 總結多項有關閱讀經驗與閱讀能力關係的研究發現，學齡兒童自主閱讀頻率越高，其閱讀技巧越高，並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自主閱讀經驗對閱讀能力的影響力呈增加態勢。

有關華語單語家庭兒童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Lau & McBride-Chang (2005) 考察了香港小學二年級學生家庭讀寫環境因素與漢字認讀和漢語詞彙知識的關係，研究發現，排除了詞彙知識的影響後，家庭讀寫環境因素依然能夠顯著預測兒童的漢字認讀能力。Shu et al. (2002) 研究了中

國大陸小學一年級和四年級學生的家庭讀寫環境與閱讀能力的關係。結果顯示，對於一年級學生，父母與子女の分享閱讀活動顯著影響其閱讀水準；而對於四年級學生，除了父母與子女の分享閱讀活動以外，學生的自主閱讀活動也能夠顯著預測其閱讀能力。Ko & Chen (2009) の研究考察了台灣國小四年級兒童家庭讀寫環境對其閱讀能力の影響。研究者發現，包括家庭中閱讀資源の數量和兒童當前閱讀頻率在內的幾種因素能夠解釋 20% の閱讀能力の變異數 (variance)。

目前所見の文獻顯示，僅有少數幾例研究考查了雙語兒童學習社會主流語言與其家庭讀寫環境因素之關係，研究發現與對單語兒童研究所得結論大體相似。例如，Duursma et al. (2007) 調查了美國拉丁裔小學五年級英語學習者の家庭讀寫環境與其英語詞彙知識之間の關係。他們詢問了學習者家庭中英語の使用情況，英語閱讀材料の數目以及父母與子女の自主閱讀頻率和分享閱讀頻率，並測試了學習者の英語詞彙知識。研究者們發現，父母與子女の英語讀寫活動與學習者の英語詞彙知識顯著相關。對入學時即接受英語教育の學習者，父母與他們共同進行的英語讀寫活動顯著預測其英語詞彙知識；而對入學時接受西班牙語教育の英語學習者，家庭中英語の使用情況則顯著預測其英語詞彙知識。

## 2. 家庭讀寫環境與雙語環境下の母語維護

雙語或多語社會中，族裔語 (ethnic language) 通常不是社會通用語，但卻作為一部分民眾的家庭語言，在日常交流中頻繁使用，並發揮著文化傳承的重要作用，故而，族裔語往往也被稱為祖裔語或繼承語 (heritage language)。近年來，一批秉持後現代理念の學者開始反思以往語言規劃單純追求現代效率和經濟利益所產生的弊端，人們對維護族裔語言地位和發展族裔文化の意識得以提高，學者們對族裔語學習與社會主流語言學習之間關係の興趣也不斷加強，開始重新審視族群語言の重要性。因此，學習和維護族群語言在雙語或多語社會中日益受到重視 (Valdes 2005)。

如上節所述，單語家庭中兒童の語言知識和閱讀技能在多個方面都受到家庭讀寫環境の影響，而這種來自家庭の多維度影響對於雙語或多語社會中族裔語の維護顯然有著更加重要的意義。對於語言接觸 (language contact) 環境下の少數族裔或移民社區來說，家庭是實踐族裔語言の最主要環境，是維護母語の堅實堡壘。有數例關於美國華裔人群の調查支持了這

一論斷。例如，Tse（2001）調查了華語水準較高的美國華裔大學生，在應研究者要求回憶兒時家庭華語背景情況時，被訪者普遍反映當時家庭中的華語閱讀資源較多。Xiao（2008）採用類似的回溯方法發現，相較於華語水準較低的美國華裔大學生，華語水準高的學習者在兒童時期家庭中有更多的華語閱讀資源，與父母進行過更多的讀寫活動，而且個人閱讀華語資源的頻率也更高。

上述兩項研究只是間接地說明了家庭讀寫環境在華語作為繼承語維護中的作用。與這兩項研究不同，Zhang & Koda（2011）直接調查了美國華裔兒童的家庭讀寫環境，測量了他們的華語能力，並考察兩者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美國華裔小學生的自主閱讀和與父母的分享閱讀活動有相當一部分是與週末學校的功課有關，而且與課業有關的自主閱讀活動越多，與課業無關的自主閱讀活動就越少。此外，兒童的華語詞彙能力和與課業有關的閱讀活動有顯著正相關性，但是和與課業無關的閱讀活動的相關性卻不顯著。Lü & Koda（2011）進一步考察了美國華裔兒童的英、華雙語家庭讀寫環境以及他們對兒童華語和英語讀寫能力的影響。該研究發現，家庭對華語的支持除了對兒童學習華語有促進作用，同時也並不影響兒童對英語的學習。

### 3. 本項研究

上文綜述的研究多為基於單語社會家庭或華裔僅為少數族裔的美國華人移民家庭的調查，研究結論對我們考察家庭環境因素在東南亞社會中華語維護的作用有一定的啟發，但可能並不完全適用於華族人口佔全國人口比例最大的新加坡（約 74%）<sup>1</sup>。新加坡政府從獨立建國之初即實行雙語政策，在重視英語並將其作為學校教學媒介語的同時，強調保持幾個主要族群的母語（即華族的華語、馬來族的馬來語以及印度族的淡米爾語）的重要地位，強調通過正規學校教育，使各族裔學生掌握雙語、雙文（biliterate）能力。然而，由於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的地位不斷加強（有人將此過程稱為語言帝國主義；參見 Phillipson 1992）以及英語在整個新加坡教育體系中的支柱作用，母語教學和維護不斷受到弱化。其結果是，家庭語言使用不斷向英語遷移（shift），使用華語作為交際用語的家庭越來越少，進而給學校的華語文教學帶來新的挑戰。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語言現狀（sociolinguistic

---

1 根據新加坡統計局公布的最近一次（2010 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華族人口所佔比例為 74.3%。參見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s/themes/people/demo.html>。

milieu)，新加坡教育部積極調整中小學華語課程的內容和難度，以期減輕學生的學習負擔，提高學生華語文學習的興趣（2007 年開始實行的小學單元模式課程；參見趙守輝、吳福煥 2010）。然而，與華語文教育改革者的不懈努力相應的卻是家庭華語使用比例的不斷降低。新加坡教育部 2004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44.1%的小學六年級華族兒童使用華語作為主要家庭用語，到 2009 年，這一比例已經降至 37%（CLCPRC 2004; MTLRC 2010）。在大眾熱衷於討論學校華語文教育的得失時，家庭環境對華族學生（特別是低齡學生）華語能力維護的重要作用卻似乎沒能得到充分的重視。由於新加坡的雙語政策主要是通過語言教育規劃（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來實現，父母們往往把學校當成學習和保持華語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徑，而對家庭在華語文維護中的作用可能缺乏深刻的認識。

家庭環境對新加坡兒童華語學習的影響究竟如何，目前關於該課題的研究現狀又如何？就我們視野所及，有研究者從新加坡華族家庭語言背景的角度討論了家庭環境和學前兒童口語能力的關係（Zhao, Liu & Hong 2007）；有的則談及華族社群家庭語言背景對新加坡華語地位規劃（status planning）的啟示（趙守輝、劉永兵 2008）；也有的考察了學前兒童家庭語言背景與其華語口語詞彙豐富度、語法複雜度和語碼轉換方面的關係（吳福煥、趙守輝 2011）；以及家庭語言背景對學齡兒童華語交際意願的影響（Lim & Li 2012）。目前以新加坡華族家庭華語讀寫環境為對象的研究還很鮮見，對於多種家庭讀寫環境因素如何影響華族學齡兒童的詞彙知識和閱讀能力學術界也知之甚少。為了填補這一空白，並為新加坡兒童華語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圖景，我們設計了此項研究。同時，對新加坡的個案考察對其他海外華人社區（Chinese Diaspora）華語文的維護也具有啟迪價值，它有助於海外華社（包括父母，社區組織等）充分認識雙語環境下，家庭對兒童華語讀寫能力的影響，進而加強家庭、學校以及社區教育機構（如，週末學校）之間的協調合作，共同促進華語文維護。此項研究中研究問題有二：第一，新加坡華族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呈現何種特點？第二，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對新加坡華族學齡兒童的華語詞彙知識和閱讀理解能力有何影響？

## 4. 研究方法

### 4.1 研究對象

先前有關家庭讀寫環境的調查多關注學齡前兒童（也有例外，如，Shu et al. 2002），可能因為研究目的多為單語環境下母語閱讀能力的習得，兒童開始學校正規課堂教育之後，家庭在培養讀寫能力方面的作用可能降低。本研究選擇三年級學齡兒童而非學齡前兒童作為研究對象。這是因為，如前文指出，在雙語或多語環境下，家庭的作用應該是貫穿整個母語維護過程的。我們隨機選擇了新加坡三所鄰里小學的 218 名父母均為華族的小學三年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這三所學校均招收附近社區住戶的子女，所在社區的主要住戶均為中等收入工薪家庭。該樣本基本能代表普通新加坡小學三年級華族人群。研究對象平均年齡為 9 歲（ $M = 9.38$ ， $SD = 0.34$ ），其中男生 121 人，女生 97 人。表 1 呈現了研究對象家庭語言的使用情況。整體而論，學生對父母所使用的語言以及父母對學生使用的語言存在多種組合，有些學生對父親主要使用英語，但對母親則主要使用華語普通話或均衡使用華語和英語；有些學生則對父母均主要使用英語或主要使用華語普通話。

### 4.2 研究工具

#### 4.2.1 家庭讀寫環境問卷

本研究所使用的家庭讀寫環境問卷參考了 Duusma et al. (2007)（對象為美國西班牙裔兒童）以及 Zhang & Koda (2011)（對象為美國華裔兒童）等的設計。為確保所有學生在充分理解問題的基礎上作答，我們在設計問卷時考慮了新加坡三年級小學生的普遍華語水平；此外，在填答問卷時，華語老師和研究人員在語言理解方面為受訪學生提供了幫助。

表 1：研究對象家庭語言的使用情況

	兒童對母親	兒童對父親	母親對兒童	父親對兒童
主要使用英語	19.7%	23.9%	21.1%	26.6%
主要使用華語普通話	33.0%	34.4%	37.1%	35.3%
均衡使用華語普通話和英語	39.0%	33.0%	33.5%	29.8%
其他（如，華語普通話普通話和方言、英語和華語方言、僅用華語方言等）	8.3%	8.7%	8.3%	8.3%

我們通過家庭讀寫環境問卷詢問了學生的個人背景資訊（如年齡、性別）、與父母之間的語言使用、家庭華語閱讀資源、兒童華語自主閱讀習慣、父母華語閱讀習慣、以及父母與子女的華語分享閱讀習慣。家庭華語閱讀資源包括家中供兒童閱讀的華語讀物數量（例如故事書、繪本讀物等）和供成人閱讀的華語讀物數量兩個問題。學生需要從五個選項（1=幾乎沒有；2=大約 10 本；3=大約 20 本；4=大約 30 本；5=40 本以上）中選出最接近的一項。供兒童閱讀的資源越豐富，越有可能增加兒童閱讀的機會。供成人閱讀的資源則代表了父母對於華語閱讀的態度。如果擁有更多華文藏書或家長閱讀華語材料的頻率更高，往往表明家長對於華語的態度更積極，更大程度上為子女作出華語文實踐的榜樣，進而對子女華語文的學習和實踐起到潛移默化的積極影響。前文綜述中的部分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閱讀相關活動對兒童語文能力的培養可能存在著不同的影響。因此，我們對學生的自主閱讀習慣和與父母的分享閱讀習慣分別設置了兩類問題：與課業有關的閱讀活動和與課業無關的閱讀活動。對自主閱讀習慣（與課業是否相關；共 2 個問題）、分享閱讀習慣（與課業是否相關；共 2 個問題）、以及家長閱讀習慣（1 個問題）共 5 個問題，學生需要從 4 個答案中選擇最接近其自身情況的一個，包括：1=每個月閱讀 1-2 次；2=每週閱讀 1-2 次；3=每週閱讀 3-4 次；4=每天都閱讀。得分越高表示與閱讀相關的活動進行得越頻繁。

#### 4.2.2 詞彙知識測試

我們使用圖片選擇和詞素辨析（morpheme discrimination）兩項任務測試學生華語詞彙相關知識和能力。圖片選擇任務主要考察學生的接受性詞彙知識（receptive vocabulary），包括了根據詞性、頻率等標準篩選的新加坡華社均使用的 60 個華語詞（如，「巴剎」、「沖浪」）。對每個詞，學生聽錄音後從四幅圖畫中選出最能表達該詞詞義的一幅。該圖片選擇任務內部一致性信度（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Cronbach's  $\alpha$  值為 0.88。詞素辨析能力，顧名思義，指的是學生辨析不同詞境下詞素意義的能力，是一種與詞彙能力有關的元語言技能（Ku & Anderson 2003）。詞素辨析任務包括 14 道題目和一個示例。每道題均包括三個含有同一詞素的雙字複合詞。學生需要選出目標詞素義與其他兩個不同的複合詞。例如，「冷氣」、「煤氣」、「生氣」三個詞都含有「氣」，但是「生氣」中「氣」的意義與其他兩個不同，因此正確答案為「生氣」。該詞素辨析任務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70。



#### 4.2.3 閱讀理解能力測試

閱讀理解能力測試包括三篇華語短文，含兩篇記敘文和一篇說明文，共 15 個問題。每篇短文的長度在 120-150 字之間，短文後各有 5 道選擇題，題目主要涵蓋了邏輯連貫（coherence）、指代關係（co-reference）、語篇推斷（textual inference）、以及短文主題（gist）等方面的能力。對每道題，學生需要從四個選項中選出最恰當的一個答案。例如，就一篇關於小熊學理髮的故事中的指代關係，文後題目問道：「但他高興得合不攏嘴」中的「他」指的是誰？四個選項包括鬆鼠、小熊、貓小弟和獅子，均為短文中出現的角色。15 個問題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73。

### 5. 研究結果

表 2 列出了家庭讀寫環境調查問卷以及詞彙知識和閱讀理解測試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參與調查的學生家庭中供兒童閱讀的華語圖書平均約 20 本（ $M = 2.8$ ；接近題目選項 3=大約 20 本），供成人閱讀的華語圖書平均要少一些，接近約 10 本的水準（ $M = 2.33$ ）。學生在家中與華語課業有關的自主閱讀活動（ $M = 2.24$ ）和與課業無關的自主華語閱讀活動（ $M = 2.28$ ）大致平均每週 1 到 2 次。家長在家中的華語相關閱讀活動的頻率也平均接近每週 1 到 2 次（ $M = 2.13$ ）。就家長與子女的分享閱讀活動來看，與華語課業有關的活動平均頻率接近每週 1 到 2 次（ $M = 2.12$ ），而與華語課業無關的活動的頻率略低一些（ $M = 1.82$ ）。

表 2：所測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問題	題數	均值	標準差
<b>閱讀資源</b>			
兒童華語讀物數量	1	2.89	1.44
成人華語讀物數量	1	2.33	1.44
<b>自主閱讀習慣</b>			
與課業有關的華語閱讀頻率	1	2.24	1.17
與課業無關的華語閱讀頻率	1	2.28	1.14
<b>家長閱讀習慣</b>			
家長閱讀華語的頻率	1	2.13	1.23
<b>分享閱讀習慣</b>			
與課業有關的分享閱讀頻率	1	2.12	1.16
與課業無關的分享閱讀頻率	1	1.83	1.03
<b>詞素辨析能力</b>	14	7.21	2.79
<b>接受性詞彙知識</b>	60	41.38	7.62
<b>閱讀理解能力</b>	15	6.88	3.36

就家庭讀寫環境各問題的選項比例分布來看，僅三成左右的家庭有 20 本以上供成人閱讀的華語讀物，且祇有約 35%的家長平常較頻繁地閱讀華語材料（每週 3-4 次及以上）。另外，半數以上家庭有超過 20 本的兒童華語讀物，約 20%的家庭更具有 40 本以上這樣的讀物。華語自主閱讀習慣的數據表明，僅約 40%的學生在家中較頻繁地進行與課業有關的閱讀活動（每週 3-4 次及以上），較頻繁進行與課業無關的自主閱讀活動的比例與之相似。華語分享閱讀頻率的分布情況要低一些，37%左右的家長在家中較頻繁地與子女進行與華語課業有關的閱讀活動（每週 3-4 次及以上），而與華語課業無關的分享閱讀活動，該比例則僅為 24%左右，半數左右的家長幾乎很少與子女分享閱讀與課業無關的華語材料（即，每月 1-2 次）。

我們分析了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各因素之間的相關關係以及它們與華語詞素辨析能力、接受性詞彙知識、閱讀理解能力之間的相關關係。如表 3 所示，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各因素之間呈顯著的正相關性，譬如，兒童華語讀物數量和自主閱讀頻率（與課業有關和無關的相關係數  $r$  分別為 0.374 和 0.225， $ps < .001$ ）；又如，家長華語閱讀頻率和分享閱讀頻率（與課業有關和無關的相關係數  $r$  分別為 0.320 和 0.335， $ps < .001$ ），說明家庭華語讀寫環境是一個包含多種相關因素的綜合體。除此之外，大多數家庭讀寫環境因

素和學生的詞彙知識及閱讀能力呈顯著正相關。如，家庭中的兒童和成人華語閱讀資源與兒童詞素辨析能力以及接受性詞彙知識顯著正相關，但與華語閱讀理解之間相關性不顯著（分別為  $r = 0.129$  和  $r = 0.09$ ）。與課業有關的兒童自主閱讀頻率與華語詞素辨析能力、接受性詞彙知識和閱讀理解能力均存在顯著相關性（ $r$  分別為  $0.231$ ,  $0.315$  和  $0.222$ ,  $ps < .001$ ），而與課業無關的自主閱讀經驗則祇與兩項詞彙任務顯著相關（ $r$  分別為  $0.197$  和  $0.178$ ,  $ps < .01$ ），與閱讀理解的相關關係則並不顯著（ $r = 0.118$ ）。在分享閱讀方面，僅與課業有關的分享閱讀頻率與兒童的詞素辨析能力和接受性詞彙知識存在顯著的相關（ $r$  分別為  $0.150$ ,  $p < .05$  和  $0.179$ ,  $p < .01$ ）。另外，家長的閱讀習慣僅與詞素辨析能力之間有較弱的顯著相關（ $r = 0.140$ ,  $p < .05$ ），與華語接受性詞彙和閱讀理解之間相關性不顯著。最後，學生的詞素辨析能力和接受性詞彙知識均與閱讀理解能力存在較強的相關性（ $r$  分別為  $0.532$  和  $0.598$ ,  $ps < .001$ ）。

上述相關分析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各因素與華語詞彙知識以及閱讀理解能力之間的初步關係。在此基礎上，我們希望進一步了解家庭讀寫環境對幾項華語能力的預測力，換言之，我們希望了解家庭讀寫環境的個體差異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解釋學生華語能力的個體差異。為此，我們分別以華語詞素辨析能力、華語接受性詞彙知識和華語閱讀理解能力為因變量，綜合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各因素為自變量進行一系列的回歸分析。

表3：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各因素與華語詞彙知識及閱讀理解能力之間的相關關係

	1	2	3	4	5	6	7	8	9
1 兒童華語讀物數量	-								
2 成人華語讀物數量	.384***	-							
3 與課業有關的自主閱讀頻率	.374***	.290***	-						
4 與課業無關的自主閱讀頻率	.225***	.210**	.529***	-					
5 家長閱讀華語的頻率	.034	.264***	.277***	.323***	-				
6 與課業有關的分享閱讀頻率	.171**	.161*	.409***	.296***	.320***	-			
7 與課業無關的分享閱讀頻率	.118	.100	.352***	.368***	.335***	.374***	-		
8 華語詞素辨析能力	.197**	.152*	.231***	.197**	.140*	.150*	.091	-	
9 華語接受性詞彙知識	.296***	.175**	.315***	.178**	.022	.179**	.090	.503***	-
10 華語閱讀理解能力	.129	.090	.222***	.118	.103	.064	.050	.532***	.598***

\* $p < .05$  \*\* $p < .01$  \*\*\* $p < .001$ 

如表 4 所示，新加坡華族兒童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對於兒童的華語詞素辨析能力和接受性詞彙知識均有顯著的預測力，分別解釋了 8.4%的變異數（詞素辨析能力； $F = 2.76$ ， $p < .01$ ）和 14.8%的變異數（接受性詞彙知識； $F = 5.24$ ， $p < .001$ ）。家庭讀寫環境的多種因素也解釋了閱讀理解能力約 5.7%的變異數，但未能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水準（ $F = 1.82$ ， $p = 0.09$ ）。

表 4：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對華語詞彙知識和閱讀理解能力的預測力

	詞素辨析能力		接受性詞彙知識		閱讀理解能力	
	$R^2$	F	$R^2$	F	$R^2$	F
家庭華語讀寫環境	.084	2.76**	.148	5.24***	.057	1.82

\*\* $p < .01$  \*\*\* $p < .001$

## 6. 討論與結語

本文研究了新加坡華族學齡兒童的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及其與兒童的華語詞彙知識和閱讀理解能力之間的關係。通過基於鄰裡小學學生的問卷調查，我們發現，新加坡華族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呈現出如下幾個特點：第一，家庭供兒童閱讀的華語資源存在不足。雖然平均每個家庭的華語讀物的數量已接近 20 本，但不同家庭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顯著的對比是約 20%的家庭擁有 40 本以上的兒童華語讀物，而約有 50%的家庭僅有 10 本或以下的讀物。第二，家長華語閱讀實踐的榜樣性作用有限，並且對子女家中華語閱讀相關活動的介入不足。調查顯示，與兒童讀物相比，供成人閱讀的讀物（如，雜誌、小說等）數量更小，且大部分家長平時都很少進行華語閱讀相關的活動，每週平均不過 1-2 次。此外，家長與子女의 分享性閱讀活動也很有限，尤其是與課業無關的閱讀活動：平均每週低於 1-2 次，約有半數的家長限於每月 1-2 次的水準。第三，兒童家中自主閱讀的熱情不高，與分享閱讀頻率類似，與課業有關和無關的自主閱讀活動的頻率皆在平均每週 1-2 次。

上述總結也顯示出新加坡與其他海外華人社區在華語家庭讀寫環境方面的一些異同。譬如，無論從家庭華語閱讀資源還是父母對兒童華語閱讀相關活動的介入等因素來看，調查過的華人社區均呈現不足（參見 Zhang & Koda 2011 等），但新加坡的情況要更好一些，這一點顯然符合新加坡華族佔主要人口、華語在英語為主導的教育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的特點。考慮到華語是新加坡的官方語言之一，華語是新加坡多種關鍵考試的必考科目之一（如，小學離校考試，即 PSLE/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這樣的結果便不難理解。再者，與其他地區的華族相比，新加坡華族學生的家庭華語讀寫環境的個體差異似乎更大一些。有關美國華人家庭的一些調查顯示，兒童或父母關於華語讀寫環境各因素的回答集中在低水準的閱讀資源和閱讀頻率選項（Lü & Koda 2011; Zhang & Koda 2011）。而本文的調查則顯示，在新加坡，雖然低水準選項的選擇比例不低，但有些讀寫環境因素的高水準選項的比例也不小。例如，約 35%的父母每週閱讀華語材料 3-4 次或更多，約 37%的父母與子女進行與華語課業有關的閱讀活動也達到了每週 3-4 次或以上的水準。這一特點以及本文調查發現的家庭語言使用比例（見 4.1 「研究對象」）在某種意義上也反映出新加坡華社華語和英語兩種語言搭配的多樣性，即，雖然近年來華族家庭語言呈現逐漸向英語遷移的趨勢，但仍

有相當一部分家庭以華語為主要交流語言。

上段的討論中涉及到了新加坡華族家庭華語讀寫環境特點的部分原因，當然，其他的原因也可能或多或少地影響了調查的結果。例如，本研究發現父母與子女分享閱讀頻率平均較低，這一點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研究對象為小學三年級學生，並非學前兒童。前人研究分享閱讀的對象主要是學齡前兒童或者剛剛入校的小學一年級學生，家長與學前兒童分享閱讀活動往往佔據主要的閱讀活動時間。隨著兒童進入學校開始正規的語文學習及其語言文字能力的增長，兒童自主閱讀活動漸漸佔據了主要的閱讀時間，分享閱讀頻率會隨之下降。另一個原因可能與家長有關。由於受到自身華語水平的限制，家長實際參與華語閱讀活動的頻率並不高，儘管從心理上他們可能願意參與到兒童的家庭讀寫中去。此外，本研究發現家庭華語讀物（例如，華語故事書以及華英雙語圖書、報刊等）數量有限，也可能與新加坡現代資訊科技在教育中的普及和豐富且便利的社區圖書館資源有關。受到具體研究問題的限制，我們並未調查研究對象的家庭相關資訊科技（如，視訊和網路資源）的佔有率和使用這些科技進行華語讀寫的頻率，我們也未詢問參與調查的學生利用公共圖書館資源等方面，但這些問題值得作為將來研究的關注點之一。

除了考察家庭華語讀寫環境的特點，本研究還測量了學生的華語詞彙知識和閱讀理解能力，並分析了不同家庭環境因素與這些能力的關係。我們發現，儘管有家長參與的華語閱讀活動的總體頻率不高，但與華語課業有關的分享性閱讀個體差異卻很明顯，並跟學生的華語能力有著緊密的關係。與華語課業有關的分享性閱讀活動同兒童的華語詞彙知識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說明了該類型閱讀行為對華語學習的積極意義。這一點符合前人的有關發現（Sénéchal et al. 1998），同時對新加坡華族的母語維護也具有明顯的啟示作用，即，家長應更頻繁地參與子女的華語閱讀活動，增進子女的華語詞彙知識水準，使兒童更有能力和興趣積極地參加與華語閱讀相關的活動。然而，這一顯著相關性並沒有出現在華語課業無關的分享性閱讀和兒童詞彙知識的關係上。從理論上說，這兩項變量也應該存在正相關，即，與父母經常一起進行課外閱讀的兒童，詞彙量應該更大，因為他們有機會通過這類閱讀（如，了解讀物中的新詞）獲得新的詞彙知識。我們猜測，此處不存在顯著正相關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新加坡父母在華語課業無關的分享閱讀頻率上未能達到一定的閾限值（均值僅為 1.83，標準差為 1.03；詳見表 2），從而使得其與學生華語詞彙知識的相關性未能凸顯出來，這一點在近年類似的研究

中也有報導 (Zhang & Koda 2011)。

除了家長參與的閱讀活動以外，我們還發現兒童的華語自主閱讀頻率和家庭中可供閱讀的華語資源數量均與兒童的接受性詞彙知識和詞素辨析能力顯著相關，說明這兩個因素與兒童華語詞彙知識的緊密聯繫。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小學三年級學生。通過三年的小學華語學習，他們已經掌握了一定的華語書面語言知識以開展自主閱讀活動。兒童在自主閱讀過程中會接觸到許多處於相似概念框架下的新詞彙，而正如 Nagy, Anderson & Herman (1987) 所發現的，通過分析上下文，這些自主閱讀活動中所接觸到的新詞更易被學齡兒童習得和掌握，從而擴大他們的詞彙量。另外，我們還發現，兩種自主閱讀活動中只有與課業有關的閱讀活動和華語閱讀理解能力存在顯著正相關，這一點可能是因為與課業有關的自主閱讀活動（例如完成華語閱讀作業或溫習課文）相較於與課業無關的閱讀更有針對性和任務性；學生可能在與課業有關的閱讀過程中鍛煉詞彙層面以上的高級閱讀能力和技巧，因而最終與課業有關的自主閱讀不僅與詞彙層面的能力有顯著相關性，且與閱讀理解能力也存在顯著相關。

由於上面討論的相關關係，本研究回歸分析顯示了家庭讀寫環境（綜各種因素）對華語詞素辨析能力和接受性詞彙知識的顯著預測力。不過，本研究沒有發現家庭讀寫背景作為總體對華語閱讀理解有顯著的預測力。原因之一可能在於閱讀理解是複雜的高級能力，其個體差異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家庭讀寫環境可能通過其他能力對閱讀理解能力產生影響。同本研究一樣，前人的研究也表明家庭讀寫環境因素直接影響接受性詞彙知識和元語言能力。考慮到這些知識和能力對閱讀理解有直接的影響 (Anderson & Freebody 1981; Roth, Speece & Cooper 2002)，我們可以推斷，新加坡兒童的家庭華語讀寫環境可能是通過詞素辨析能力和接受性詞彙知識對他們的華語閱讀理解能力產生間接的影響。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中學生參與的家庭閱讀行為可能更多地關注了詞彙層面的學習，而對深層篇章理解的關注不足。由於影響閱讀理解能力的因素除了詞彙知識等以外，還包括推斷作者意圖和引申文意的能力以及閱讀監控策略等，因此，家庭環境因素對華語閱讀理解能力的影響力未能充分地體現出來。條件所限，本研究對學生某一方面能力（如複合詞詞素意識）的測量只使用了一項測試，可能未能全面表徵學生在這一方面的能力。將來的研究可以考慮採用多項不同測試，以求對學生能力做更全面的測量。

本文的發現對新加坡的華語教學和維護，乃至其他海外華人社區的母語維護，很顯然有著重要的啟迪價值。眾所周知，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書面語更是承載著一個族群文化的精神家園。因此，負載文化傳承功能的族裔語或母語的維護近些年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Valdes 2005）。在很多海外非華人佔主體的社會中，華人社團積極投身本地區的華語維護，行動之一便是建立了各種類型的社區華語學校（如，週末學校），希望能幫助下一代掌握一定的華語口語和書面語能力（Zhou & Li 2003）。然而，受到大的語言環境的影響（如，在歐美等地），這一切努力的成效不盡人意，其原因之一便是家庭在母語維護中的重要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視。在華人佔國家人口比例最大的新加坡，獨立建國之初便確立了「英語必知」的雙語教育政策（Pakir 2008）：英語為教學媒介語，在重要性上體現為「第一語言」；包括華語在內的三大族裔的母語為「第二語言」，也是學校正規教育的重要科目之一。這種教育領域語言規劃的結果之一便是家庭語言逐漸從母語向英語的代際遷移。如前文所述，公眾期望學校解決子女的華語教育問題，華語教育政策制定者們也不斷改革課程，以應對家庭乃至整個社會的語言遷移所帶來的挑戰，但結果仍不甚理想，歸根究底還是因為母語維護始於家庭這個事實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視。顯然，保持和提高華族兒童的華語水準（包括讀寫水準）的努力不能僅僅局限於學校，無論是歐美的社區學校還是新加坡的正規學校。華族家長應該認識到如本文和先前的一些研究所呈現的家庭環境對子女華語能力的影響，積極地參與和指導子女進行更多的華語活動。要實現母語的有效維護，「挽回語言遷移」（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Fishman 1991），家庭的作用至關重要，這一點值得所有關注海外華人社區華語維護的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社區領袖及華人父母共勉。

## 引用文獻

- Anderson, Richard C., and Peter Freebody. 1981. Vocabulary knowledge. *Comprehens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Reviews*, ed. by John T. Guthrie, 77-117.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
- Anderson, Richard C., Paul T. Wilson, and Linda Fielding. 1988. Growth in reading and how children spend their time outside of school.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3: 285-303.



- Aram, Dorit, and Iris Levin. 2001. Mother-child joint writing in low SES: Socio-cultural factors, maternal mediation and emergent literacy. *Cognitive Development* 16: 831-852.
- Bybee, Joan. 2011. *Language, Usag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iu, Ming Ming, and Catherine McBride-Chang. 2006. Gender, context, and reading: A comparison of students in 43 countries.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10: 331-362.
- CLCPRC. 2004. *Repo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Review Committee (CLCPRC)*.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 Cunningham, Ann E., and Kieth E. Stanovich. 1998. The impact of print exposure on word recognition. *Word recognition in beginning literacy*, eds. by Metsala, Jamie L. & Linnea C. Ehri, 3-40.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Duursma, Elisabeth, Silvia Romero-Contreras, Anna Szuber, Patrick Proctor, Catherine Snow, Diane August, and Margarita Calderon. 2007. The role of home literacy and language environment on bilinguals' English and Spanish vocabulary development.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 28: 171-190.
- Ellis, Nick C. 2002. Frequency effect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A re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4: 143-188.
- Evans, Marry Ann, Deborah Shaw, and Michelle Bell. 2000. Home literacy activities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4: 63-75.
- Fishman, Joshua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Frijters, Jan C., Roderick W. Barron, and Maria Brunello. 2000. Direct and mediated influence of home literacy and literacy interest on prereaders' oral vocabulary and early written language skil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2: 466-477.

- Ko, Hwawei, and Chan Yi-Ling. 2009. Family factors and primary students' reading attainment: A Chinese community perspective.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42.3: 33-48.
- Ku, Yu-Min, and Richard C. Anderson. 2003. Development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16: 399-422.
- Koda, Keiko. 2008. Impacts of prior literacy experience to learning to read in a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o Read across Languages: Cross-linguistic Relationships in First- and Second-language Literacy Development*, eds. by Keiko Koda & Annette M. Zehler, 68-96.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au, Yuet-Han Jasmine, and Catherine McBride-Chang. 2005. Home literacy and Chinese reading in Hong Kong children. *Early Education & Development* 16: 5-22.
- Leichter, Hope J. 1984. Families as an environment for literacy. *Awakening to Literacy*, eds. by Goelman, Hillel, Antoinette A. Oberg & Frank Smith, 38-50. Portsmouth, NH: Heineman Educational Books.
- Lim, Xiaoyuan Janice, and Li Li. 2011. Mother tongue among Singaporean Chinese children: Context, gender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Paper presented in the 2011 TE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ICE 2011), 15<sup>th</sup> to 18<sup>th</sup> December 2011, Kaohsiung, Taiwan.
- Lü, Chan, and Keiko Koda. 2011. The impact of home language and literacy support on English-Chinese biliteracy acquisition among Chinese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Heritage Language Journal* 8: 44-79.
- Mol, Suzanne E., and Adriana G. Bus. 2011. To read or not to read: A meta-analysis of print exposure from infancy to early adulthoo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 267-296.
- MTLRC. 2010. *Nurturing Active Learners and Proficient Users: Mother Tongue Languages Review Committee (MTLRC) Report*.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 Nagy, William E., and Richard C. Anderson, Patricia A. Herman. 1987. Learning word meanings from context during normal reading.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4: 237-270.

- Pakir, Anne. 2008. Bilingua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sup>nd</sup> ed.) *Volume 5: Bilingual Education*, eds. by Jim Cummins & Nancy H. Hornberger, 91-203. New York: Springer.
- Phillipson, Robert.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th, Froma P., and Deborah L. Speece, David H. Cooper. 2002.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ral language and early read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95: 259-272.
- Sénéchal, Monique. 2006. Testing the home literacy model: Parent involvement in kindergarten is differentially related to grade 4 reading comprehension, fluency, spelling, and reading for pleasure.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10: 59-87.
- Sénéchal, Monique, and Jo-Anne Lefevre. 2002.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skill: A five-year longitudinal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73: 445-460.
- Sénéchal, Monique, and Jo-Anne Lefevre, Eleanor M. Thomas, Karen E. Daley. 1998.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home literacy experiences on development of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3: 96-116.
- Shaffer, David, and Katherine Kipp. 2010.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8<sup>th</sup>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Cengage Learning.
- Shu, Hua, Li Wenling, Richard C. Anderson, Ku Yu-Min, and Yue Xuan. 2002. The role of home-literacy environment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Chinese Children's Reading Acquisition*, eds. by Li, Wenling, Janet S. Gaffney & Jerome L. Packard, 207-223.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tanovich, Keith E. 1986. Mathew effects in reading: Some 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acquisition of literacy.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21: 360-407.
- Tomasello, Michael, Malinda Carpenter, Josep Call, Tanya Behne, and Henrike Moll. 2005. Understanding and sharing intentions: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ogni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 675-690.

- Tse, Lucy. 2001. Heritage language literacy: A study of US biliterates.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14: 256-268.
- Valdes, Guadalupe. 2005. Bilingualism, Heritage language learners, and SLA research: Opportunities lost or seized.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89: 410-426.
- Weigela, Daniel J., Sally S. Martinaand, and Kymberley K. Bennett. 2006. Contributions of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to preschool-aged children's emerging literacy and language skill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76: 357-378.
- Xiao, Yun. 2008.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in CHL development.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Fostering Rooted World Citizenry*, eds. by He, Agnes Weiyun & Yun Xiao, 151-166.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Resource Center.
- Zhang, Dongbo, and Keiko Koda. 2011.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and word knowledge development: A study of young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heritage language.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34: 4-18.
- Zhao, Shouhui, Liu Yongbing, and Hong Huaqing. 2007. Singaporean preschoolers' oral competence in Mandarin. *Language Policy* 6.1: 73-94.
- Zhou, Min, and Li Xi-Yuan. 2003. Ethnic language schoo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100: 57-73.
- 吳福煥、趙守輝. 2011. 〈基於語料庫的新加坡學前兒童華語能力差異研究〉, 發表於第十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 (2011.12)。臺北。[Goh, Hock Huan, and Shouhui Zhao. 2011. A corpus based study on Singaporean preschoolers' competence in Mandar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2011.12). Taipei.]
- 趙守輝、劉永兵. 2008. 〈新加坡華族社群家庭用語的社會語言學分析〉, 《社會科學戰線》, 第 8 期, 131-137。[Zhao, Shouhui, and Liu Yongbing. 2008.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home language use in Singaporean Chinese commun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Front* 8: 131-137.]

趙守輝、吳福煥. 2010. 〈新加坡小學單元模式課程效績評鑒：本地經驗及國際意義〉，《華語文教學與研究》，第 7 卷第 3 期，55-74。[Zhao, Shouhui, and Goh Hock Huan. 2010. An evaluative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Chinese curriculum in Singapore primary schools: Local experience and wider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7.3: 55-74.]

[審查：2013.1.29 修改：2013.9.24 接受：2013.10.28]

李麗

Li LI

Singapore Center for Chinese Languag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87, Ghim Moh Road, Singapore 279623.

li.li@sccl.sg

張東波

Dongbo ZHANG

Depart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620 Farm Lane, East Lansing MI 48824, USA.

zhangdo6@msu.edu

趙守輝

Shouhui ZHAO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Bergen  
P.O. Box 7805, N-5020 Bergen, Norway

shouhui.zhao@gmail.com

## **Singaporean Chinese Children's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ese Lexical Knowledge and Reading Ability**

**Li LI**  
Singapore Center for  
Chinese Languag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Dongbo ZHANG**  
Department of  
Teacher Educ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Shouhui ZHAO**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Bergen

###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Singaporean Chinese children's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various environment factors with children's Chinese lexical knowledg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Two hundred and eighteen grade 3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a home environment survey that covered availability of Chinese reading resources, parents' reading practice, child-independent reading, and parent-child shared reading. They were also tested on Chinese morpheme discrimination skill, receptive vocabulary knowledge,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bility. Children's responses indicated that on average, Chinese reading materials at home were limited; their independent home activities related to Chinese reading were not very frequent; and their parents were not very inclined to Chinese reading-related activities, either by themselves or with their children.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home environment as a whol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children's morpheme discrimination skill and receptive vocabulary but not reading comprehension. It was inferred that home environment might have an indirect effect on Chinese reading comprehension via lexical knowledge among Chinese children in Singapore.

**Keywords:** Chines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lexical knowledge, reading comprehension, Singapore.